

编者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铭记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付出鲜血和生命的烈士,激励和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县委宣传部面向全县开展“我与红色文化”主题征文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和踊跃参与。经评委会初评和终评,成人组、未成年人组共评出46篇获奖作品。本报现遴选部分成人组获奖作品予以刊登,敬请关注。

从「土翻译」到「讲解员」

张同祥

4月5日下午,我正在滨海镇党员实践教育基地和滨海镇历史文化展览馆为前来参观者讲解滨海镇历史,当步入“红色记忆”展区讲述老红军刘月明、黄水旺、孙德明革命故事时,突然从参观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朝我大声说:“您就是张同祥先生吧?我是老红军黄水旺的女儿,名字叫黄素梅,今天清明节,我带着几个孙子回家祭祖,特地到展览馆让孩子们看看爷爷的革命历史,真巧在这遇见你,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你曾多次为我父亲黄水旺做过‘翻译’,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就当‘讲解员’,真是了不起啊……”

黄素梅的一席话,勾起我的记忆。90年代初,老红军黄水旺住在八大家桥南街坐东朝西的小平房,那时我在滨海广电站任站长,一有空常去他家听黄老讲革命故事,日子长了,他的山西口音我也逐渐听懂。1994—1996年三年间,镇党委书记政府邀请他到学校、单位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因为他是山西人,多年来口音未变,做报告时台下听众听不懂的人比较多,时任镇党委书记高正俊就让我帮他当“翻译”,这一当就是3年,共“翻译”了20多场的报告。

黄水旺,山西长治人,1912年4月出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逝,生活艰苦伶仃,以乞讨为生。1937年2月在陕西高柳加入红军第十五军团,担任75师常清副连长的马夫。

黄水旺投身革命队伍后,参加过大小战斗几十次,历任班长、排长等职务,直到上世纪70年代,被确认为红军战士,1998年9月病逝,终年86岁。

这么多年过去了,红军的后代还想起我为他爹当“土翻译”的那点事,我

感到十分欣慰。

八大家,在那烽火岁月里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和重要大后方,一个个红色革命故事广为流传。在新四军三师和盐垦区的党、政军机关的领导下,有很多知名将领,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为寻找革命故事,留下历史记录,我从2006年起,历经10多年,行程千里,奔走北京、天津、上海、南通、海口等地,搜集挖掘300多珍贵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资料,腾出自家两间门面房,开办了“滨海镇历史人文展览馆”,免费向百姓开放,自己也担任方言“讲解员”,这一讲就是15年。

历史图片展览馆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逐步扩大,如今已成为“滨海镇党员实践教育基地”和“滨海镇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节假日,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人多人少,只要有参观者,我都热情接待,认真讲解,也从未向政府要一分工资报酬。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共接待参观者8万多人次,将每位参观者都带入那曾经的记忆长河中。

去年农历腊月初六日下午,我在滨海县的老家家里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是原华成公司、民主爱国人士张中忠的二女儿张万舒,从上海回天津老家,特地绕道来到八大家,想看看他父亲的历史展览资料。我二话不说,立即赶回展览馆,为她一家讲解了老一代革命家黄克诚、张发奎、钱瑛等在华成的往事以及她父亲张中忠积极支持抗日的故事。参观结束,天色已晚,我将她们一家请到自己家里,为她们做了一桌滨海特色的菜肴,张万舒边吃边高兴地说:“张老,你不光为我们讲解滨海历史,还为我们介绍和品尝滨海的特产品,真是双丰收啊!”

多年来,我从“土翻译”变为“讲解员”,通过与老红军的接触与对革命历史图片的记忆,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们为中华民族崛起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面向未来,推动社会发展,再现时代风采,再建历史新功。

地处黄海之滨、射阳河畔的射阳县是有名的革命老区。据县志记载,在历次革命斗争中,为解放射阳大地而浴血奋斗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有1631人。其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捐躯者最多,共1481人。先烈们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的丰功伟绩,纵有如椽巨笔也难以一一记述。他们在射阳这片热土上,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红色文化,与世长存,永放光芒。

射阳人民为了纪念和缅怀革命先烈,除了清明节组织祭扫烈士墓、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立纪念碑、建纪念馆之外,还有一种更崇高的纪念方式——将一些乡、村、街道、学校以烈士的名字命名。使得烈士英名传之千古,浩气长存天地之间,从而让一个个烈士成为全县百万人民心中世代相传的巍峨丰碑。

在这样一个以烈士命名的地方,在这一座座巍然丰碑的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故事。

县城北侧有条“发鸿街”,是以烈士陈发鸿的名字命名的。陈发鸿(1915-1944),陕西渭南人,新四军3师8旅22团团长。1944年10月19日,陈发鸿奉命率部会战24团攻打盩厔在县城合德村的日伪军。10月21日傍晚,全城的伪军基本消灭,还有几十个日本鬼子躲藏在棉花公司据点里,倚仗坚固的碉堡和猛烈火力负隅顽抗,陈发鸿一声令下,身先士卒,带领突击队用手榴弹炸毁了碉堡,彻底消灭了敌人,合德解放。



没有脚趾的亲家

顾长清

你见过一双脚都没有脚趾的人吗?“没有见过!”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回答。而在县城大宾馆楼205室,就住着一位10个脚趾全部掉光的老亲家,他叫左允祺,今年90岁,是抗美援朝战士。

他20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随所在部队来到抗美援朝前线。

10月的朝鲜,已经进入到了隆冬,他和战友们过江的时候,朝鲜的大地上已遍满大雪,气温下降到零下10多度。夜间,每人身背几十斤食物和武器在雪地上步行。肚子饿了,拿块饼干充饥;口渴了,找碗凉水喝上几口。休息就在雪地上,人靠人地坐在各自的被包上打个盹。环境尽管是那样艰苦,但谁也不叫一声苦,因为大家出发时,对可能遇到的一切艰苦都有充分思想准备,脑子里想的不是怕吃苦,而是准备献出生命。左允祺所在的部队,首先到达的地点是朝鲜的长津湖机场,任务是全歼机场里的一万多名敌军。在三天四夜的激烈战斗中,敌军彻底失败。

这场战斗结束,左允祺又投入到另一场战斗。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轰炸,他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临时隐蔽在一座大山背后,那里的气温低到零下40多度,外面下的大雪有人人的膝盖,鞋子冻结在雪地上无法拔出。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一个周,左允祺的10个脚趾就是在那一周被冻掉的。先开始冻肿了还知道疼,然后冻麻木失去知觉,就再也不知疼痛了,手一碰脚趾就掉下来了。脚趾掉了,脚上出血了,没有纱布包扎,只好从自己的棉袄上撕块布下来裹。当时冻掉手指,脚趾的不只是他一个,有很多。后来部队撤退,脚趾冻掉了的人无法行走,担架队一时又跟不上,只好就在地上往前爬。左允祺清楚地记得他在地面上爬了60多里,一直爬到有担架队来抬他为止。和他一起去的是150个人,而回国时还只剩了30多个,每想起死去的战友,他心里就万分悲痛。

左允祺是1951年1月回国的。回国后,国家把他们看成是有功之臣,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首先把他们安排到临江陆军32医院疗养了一年。在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天早晨都要给他们喝牛奶,中午都是大米饭和两菜一汤。身体全部恢复健康后,由各省带去分配工作,他分配到射阳县印刷厂做保管员。退休时,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我和左允祺是亲家。20多年来,我们两亲家一直和睦相处,他比我大7岁,因此,我对他是三种身份看待:一是亲家,二是兄长,三是身边学习的榜样。我感到有这样的亲家而光荣,便以多年搞新闻宣传的责任感,尽力宣传他的先进事迹。

今年是建国70周年,是集集中宣传在战争中有功人物的年份,我已做好再度宣传他的准备。特别是暑假要组织更多的中小学生在接受他的教育。

寻找红色特工——戴龙

李泉

1960年,我陪着姨姐去已迁往宁波的东海舰队,门卫拦住我们,姨姐说:“我是戴龙的妻子,来这寻找丈夫戴龙的下落。”门卫把手电打到情报处,一位干部把我们带到情报处,处长说:“戴龙是我批准他去台湾的。我查阅档案,再向领导汇报,给你答复。”从此我便知道戴龙的大概情况:戴龙于1949年去台湾做地下工作,1951年被杀害。因为涉密,其它情况不宜公开。

1962年,我从射阳师范下放回乡务农,翻阅戴氏家谱,又两次去宁波、青岛、台湾,还原了戴龙的历史档案。

戴龙,男,原名戴云门,1908年12月7日出生于海河镇戴家圩,自幼聪明好学,六岁进入戴圩私塾,跟堂祖父戴日刚、叔父戴新学文化,13岁考入阜宁沟墩高级学堂,接受江苏省议员、书法家、著名文人陈为轩进步思想教育,18岁考入阜宁中学。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家乡参加抗战,临时时写了一首诗表示自己的决心:

忧国忧民九洲痛,不悲不欢不恋旧。
忧国忧民九洲痛,功名不成誓不休。
在苏南期间,戴龙先后在江苏水陆公安教导大队、江苏警官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随国民党部队

斗争表现出色,敌人对她恨之入骨。1946年反动势力猖狂一时,挨门逐户放火,搜捕刘桂英。为了保护群众和其他干部,刘桂英挺身而出,厉声斥敌:“不许糟蹋群众,我刘桂英就在这儿!”穷凶极恶的敌人逼她交出党员、干部名单,并用刀割她腿上的肉。刘桂英不畏酷刑,依然辞斥斥责敌人,始终没有交出一个党员干部名单,敌人恼羞成怒,用水棒将刘桂英活活打死,并砍下她的头和四肢示众。刘桂英英勇牺牲时年仅28岁。全国解放后,射阳县人民政府用烈士的名字命名了桂英村、桂英小学和桂英中学。

崇高的纪念

顾玉华

了,英雄团长陈发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9岁。公葬时,新四军3师黄克诚师长亲书挽联:“痛一弹无情夺吾勇将,愿三军用命歼彼凶顽。”为纪念烈士,县政府决定,将烈士牺牲的街道命名为发鸿街。

特庸镇则是以烈士胡特庸的名字命名的。胡特庸(1913—1948),湖北省大冶县人。他1935年即参加革命,1940年随新四军到盐城。1946年组织上派胡特庸到盐东县工作(现射阳县),先后担任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兼县委武装总政委等职。1948年6月8日,胡特庸和战友从北洋岸(今特庸镇境内)乘渡船往南洋岸秘密会议。船至河中心时胡特庸突然发现船上有一批化了装的敌人在跟踪他,随即跳水,不幸被敌人开枪击中,烈士鲜血染红了新洋港。胡特庸以身殉国时年仅34岁。盐东县委决定将烈士牺牲地永丰区改名为特庸区(即今特庸镇)。

射阳还曾有一所颇具名气的桂英中学,也是以烈士的名字命名的。这位烈士叫刘桂英。她的事迹与刘胡兰的事迹非常相似。她本是乡、区妇救会主任,对敌

斗争表现出色,敌人对她恨之入骨。1946年反动势力猖狂一时,挨门逐户放火,搜捕刘桂英。为了保护群众和其他干部,刘桂英挺身而出,厉声斥敌:“不许糟蹋群众,我刘桂英就在这儿!”穷凶极恶的敌人逼她交出党员、干部名单,并用刀割她腿上的肉。刘桂英不畏酷刑,依然辞斥斥责敌人,始终没有交出一个党员干部名单,敌人恼羞成怒,用水棒将刘桂英活活打死,并砍下她的头和四肢示众。刘桂英英勇牺牲时年仅28岁。全国解放后,射阳县人民政府用烈士的名字命名了桂英村、桂英小学和桂英中学。

在射阳,以烈士命名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如“正香村”,“正香小学”就是以烈士董正香的名字命名的;“曙光村”,“曙光小学”就是以烈士戴曙光的名字命名的;“甲侯村”,“甲侯小学”就是以烈士倪侯侯的名字命名的;“诚民村”,“诚民小学”就是以烈士李诚民的名字命名的;“杨村小学”就是以烈士杨村的名字命名的……

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纪念,几十年来,不管区划怎么变,体制怎么改,射阳以烈士命名的地方始终保持烈士的名字不变。比如,公社化时叫特庸公社,接下来叫特庸乡,现在叫特庸镇。又如,原来的发鸿街,现在改为发鸿居委会,至于一些小学校的整合,行政村的合并,以烈士命名的名称一律不允许改变。

我劳劳模中最著名的应是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新坝公社新湖九队生产队长、今年已93岁高龄的巴一枪。遗憾的是,这位闻名全国、在我家家喻户晓的劳模,我这个做了多年宣传工作的“新闻人”,却一直没有机会谋面。不久前,我打听到巴老现在就在住在县城的养老院,立马冒着酷暑,去看这位我仰慕已久的人。

巴老识字不多,淮海战役他作为民兵踊跃上前,冒着枪林弹雨推独轮车碾转苏鲁豫3省,1948年在火线入党。解放后,他回乡任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公社副书记,把战争年代那一股热劲投入到家乡建设中。特别是探索出在麦田套种春玉米,在玉米田里又套种红薯这个“两熟改三熟”的栽种方式,至1970年,把新湖九队原来亩产只有三四十斤皮棉和二三百斤小麦的盐碱地,改造成半亩满产一吨粮的“棉粮仓”,创造了全国产粮史上的奇迹。40多年前,新湖九队集体储备粮20多万斤,队里不仅有公共食堂,还在全国农村率先建立了居民点,5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了公房。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县里还专门在新湖大队建立了接待站。

当时的盐城地委、江苏省委书记等多位领导先后多次前来视察,有一位省委书记一个星期来了两次。时任县委书记的李子健到了外地,逢会必讲“问讯射阳何所有?射阳排出新湖九!”

当时还有这样的顺口溜:“吃了五谷想六谷,有了两熟改三熟”,“唐宋元明清,没听说亩产粮食过两千斤!”老百姓就是用这种朴素语言,称赞巴一枪。

当年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裴艺元、顾长清回忆说,那时,新湖九队在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生态化方面也走在前列。上世纪70年代,队里就买了拖拉机、收割机,用草把诱蛾杀虫,减少农药污染,食堂用沼气生火做饭。著名作家陆文夫在这里深入生活几个月,吃蔬菜都是无公害的,黄瓜用衣服揩揩就吃。上世纪80年代,射阳皮棉、水产双超百万担,多次夺得全国棉花状元县,这与巴一枪这样的先进典型引路有很大关系。

早在1963年,巴老就到上海出席了华东“农农会”,听周总理作重要讲话,并受到毛主席接见。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通讯《种棉花,学老巴》。巴老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了名。

1978年,巴老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常委,当年还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他又当选全国劳模,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奖状。

巴老说:“党和人民的信任,让我这个泥腿子走进人民大会堂。要说荣誉,那是全县百万人民的荣誉;要说地位,那是新中国提高了农民的地位。”

有一次,省人大召开常委会选举代表团团长,省长顾秀莲请巴老第一个发言,巴老畅所欲言,意见最终被采纳。巴老发自内心的说:“新中国真正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对国家并没有多少贡献,现在,政府每月还发给这个泥腿子5000多元退休金,这在旧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去年,我的腿跌伤了,县委领导又专门上门看望,这里就是射阳的有功之臣,专门安排我住进县养老院,这说明的条件和服务比宾馆一点都不差。”

我眼前的巴老,身板硬朗,气色很好,声音洪亮,只是双耳听力不太好。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巴老,现在社会上许多青年人追星,我是农民的后代,在射阳,您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星’,您能为我签个名吗?”巴老说:“签个名可以,但我不是什么‘星’,我永远是个农民。”说完,他戴上眼镜,拿起钢笔,一笔一划地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3个大大:巴一枪。

筱萍将戴龙的骨灰运回上海,有关部门在浦东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民政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2014年6月1日,我和戴龙唯一后代戴筱萍将戴龙骨灰运回戴龙衣胞之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群众和学生参加了大会。

我的外祖父戴日刚创办的“戴圩私塾馆”,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后代勤读书、会学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戴圩文化”。戴龙是戴圩文化的主将,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栋梁人才——

戴元光只有初中文化,通过自学成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茹芬是“文革”中的高中生,成为大学教授、北京高等职业院校院长、党委书记,对北京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戴勇,到部队服役后,在病理研究方面有重大创新,成为副职干部;

孙跃吾,盐城“挺大”第一届毕业生,担任无锡第一任公安局长;

孙德秀,初中学历,在德语翻译方面有重大建树,任教授级译评;

……

我,李泉,就是在“戴圩文化”熏陶下,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成为县、市、省先进人物,正在撰写“红色特工——戴龙”的传记,将戴龙的革命事迹传播到祖国四面八方。

70年,红色文化伴我行

江正

笔砚陪伴我匆匆地跨越两个世纪,风风雨雨、磕磕碰碰度过了70多个春秋,但我的写作癖一直未改,一路走来一路歌,我与红色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1935年,我出生在苏北黄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家境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童年时要上学读书比登天还难。记得有一次我向父亲提出要去看书,父亲说:“我们家几代人没有文化不也过来了吗?”“父亲一字不识,以捕鱼维持生计。没办法,我就用母亲卖鱼给我的零花钱,聚积起来,买来木墨砚纸(大伤)砚和《柳公权》字帖。一个字不识怎么办?我就依葫芦画瓢,一画就是8年,一万多张大仿字,至今还珍藏在小书橱柜底层。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我已16周岁,这才有了上学。1957年,在射阳县初中毕业后,因家寒,辍学当了小学教师。任教10年间,先后为中、小学校撰写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相声小段、童谣、儿歌、说唱等百余篇弘扬真善美、小型文艺节目,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文化生活,也激发了孩子们奋发向上的热情。其中,有一首应时的儿歌《敬教日开换新天》和一首新体诗《你说开心不开心》,分别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和《新华日报》副刊上。自此,我情有独钟爱上了文艺创作这一行。

(二)

1969年,我被射阳县文教局调到县文化馆任副馆长,分管全县学校、群众文化辅导和《革命文化》(10年后更名为《群众文化》)编辑出版工作。30多年,寒来暑往,风里来雨里去地奔走在学校、乡村,爬过数以千计的沟沟坎坎,访问过千家万户;了解乡土风情、人文典故。我花10年时间,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业余文艺创作骨干。借助《群众文化》这一平台,先后发表了《共产党比天高》、《千年桔树又开花》等960多个演唱节目,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又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既歌颂了改革开放好政策,又唱出了人民群众心底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肺腑之言和感激之情,这是红色文化的魅力。

(三)

当大江南北唱响了《春天的故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春风,唤醒了百姓世代代梦想,使农民久旱逢春雨,人人笑逐颜开。我融景生情,创作了一首《射阳河畔好风光》民歌,词美曲畅,脍炙人口,很快风靡一个地区,经久不衰,从农村一直唱到省城,至今,仍然受百姓的喜爱。

目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济空前高涨,农民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追巴老这颗「星」

彭辰阳